

陆树藩与中国救济善会的人道行动(上)

■ 池子华



陆树藩：
中国救济善会缔造者

陆树藩(1868-1926),字纯伯,号毅轩,出生于浙江湖州。其父陆心源,曾任广东高廉道、福建盐法道,因谤罢官。1891年,陆心源得旨升复原官。翌年,陆树藩即随父去京候聘。抵京后,在陆心源一些故旧好友提携下,陆树藩得加侍读衔,赏戴蓝翎。不久,陆心源南旋,陆树藩留京任内阁中书本衙门撰文,后任庆典撰文方略馆、会典馆校对官。

“时正值光绪新政前后,而户部尚书为光绪帝之师翁同龢。陆树藩因年轻,思想较开明,对新政较易吸收,但因光绪年代一些旧官为其父之上司及好友(如李鸿章、孙毓汶、陆润庠、瞿鸿禨等),因而受老前辈的影响,不敢于锋芒毕露。”在陆树藩看来,“改革新政难于成就,因而于戊戌年请假回乡,欲不求仕途。其后即返沪利用当时在沪祖传家业,进行建屋与经商”,同时投身公益事业,其中发起创办湖州中西学堂就是一例。

1898年7月26日《申报》刊登了他和弟弟在“天甌日”(阴历六月六日)草拟的《募助湖州中西学堂启》:“本年叠奉谕旨,开办京师大学堂并各省府厅州县一律开办中学、小学以广造就。伏念浙西为人文渊藪,吴兴乃富有名邦,亟应实力振兴,遍开风气,广设学校培养成材。况值此天步艰难,民心浮动,多财适足以贾祸,毁家即所以保身。今树藩等敬遵先荣禄公遗命,将守先阁所藏中西书籍全数归公,捐入学堂,并再措捐巨款,备器建堂。惟延聘教习,供给学生,常年需费,独力难支,不得不广为募助。想诸君子情关桑梓,自必药子成全,慷慨输将,多多益善。倘他日教化有成,人才蔚起,不独乡里增光,兼为朝廷生色。此树藩等所私心祷祝者耳。”不难看出,陆树藩虽在沪经商,但心系桑梓,为湖州教育事业奔走呼号。

在沪期间,陆树藩“暇时与友交游,并在沪娶妾徐氏。孰知休闲不长,仅仅二年至清光绪二十六年(庚子,1900年),庚子之难发生。陆树藩出于义气,在沪

“

1900年,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。6月17日,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;7月14日,占领天津。义和团虽浴血鏖战,但无力阻止八国联军北进,8月15日慈禧太后偕光绪帝西逃,16日北京沦陷。战火在天子脚下蔓延,生灵涂炭,死伤累累,呼唤人道主义慈悲,呼吁红十字关怀。为救死扶伤,浙江著名绅商陆树藩等在上海发起‘中国救济善会’,遵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精神,救护伤兵难民。这是中国人自办红十字会之开端。毫无疑问,陆树藩和其创建的中国救济善会唱响了中国人自办红十字会之先声。庚子救援中,陆树藩虽竭力而为,历尽艰辛,业绩令人瞩目,但仍不免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。



陆树藩(左三)1913年二月初三日与刘承幹、席锡蕃、杨赞卿等人合影于刘承幹沪西双清别墅

筹组京津救济善会”,从而使陆树藩的人生“起了一个大的转折,经历了一段传奇式的生活”。

1900年,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,因该年为农历庚子年,史称“庚子之变”。京畿之地,烽烟滚滚,官绅商民,均遭池鱼之殃,流离失所,苦不堪言。面对如此浩劫,江浙一带的绅商发起救援行动,其中陆树藩发起成立的中国救济善会,成为救援的主导力量。

陆树藩走上慈善之路,与其父陆心源的“言传身教”不无关系。陆心源是著名文人学士和大藏书家,而且热心社会公益事业,常捐款捐物赈济各地灾荒。造福故里的善举颇多,“积谷、育婴、造桥诸事,无不任之”,曾出资兴建升山桥,修复安定、爱山书院和仁济善堂,举办义学等,颇得乡里称誉。受其父公益善举的熏陶,陆树藩深受教益,自小就“乐善好施,爱国爱民”,因而“平日见亲故人之匮乏者,莫不竭力扶持”。“庚子国难”发生后,陆树藩自然不会置身世外。在他的奔走呼

下,中国救济善会得以创立。如他与友人信中所说:“弟于庚子秋间,念时艰之迫切,悯民生之涂炭,创兴救济善会。”

1900年9月9日,《申报》发布《救济善会启》称,为救助北方难民,“先集同志筹捐举办,拟派妥实华人并延请洋医医赴津沽一带,遇有难民广为救援,名曰中国救济善会”。中国救济善会简称“救济善会”“救济会”,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。而此时距帝都陷落已20余日,距天津陷落近两个月。

植入红十字会性质的新型善会

中国救济善会的成立,对陆树藩而言,有两大关键问题需要解决:一是寻求支持;二是如何运作。而恰恰在这两大问题上,颇费周折。

陆树藩自身有一定经济实力,浙江候补道潘炳南也热情高涨地表示“先垫巨款”,救援经费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,关键在于如何得到上海慈善界的支持,

毕竟陆树藩资历浅,他在上海慈善界的地位不足以组织一场规模巨大的救援行动,因而特别渴望得到慈善界领袖人物严信厚的臂助。为此,陆树藩曾专程拜会严信厚等,但遭到“婉辞谢绝”。无奈,陆树藩只好向李鸿章求助。

原来,清政府为了与八国联军议和,下诏将两广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委以和谈“全权大臣”。1900年7月21日,李鸿章抵达上海,直至10月5日离沪北上。期间,陆树藩多次拜访,提出组建中国救济善会的构想。“由于李是陆之父的上司,以前在京为官时亦受李之指点”,陆树藩的设想得到李鸿章的赞赏和支持。这使陆树藩深受鼓舞。

然而,救济善会如何运作,却成为困扰陆树藩的一大难题。毕竟在战争状态下开展人道救援,非同一般性自然灾害的救助,更何况八国组成的联军对华作战,没有交战方的认可、保护,贸然前往,不啻为自投罗网。在这样的“非常时期”,单纯的善会

善堂已无济于事,也不可能得到八国联军的承认。

在战争状态下,只有红十字会才能得到交战双方认可而进入战地。除此之外,别无选择。红十字理念在上海的传播,给予陆树藩以灵感。因此,他设想能够创建一个红十字会组织来执行救援使命。他在致江苏布政使陆元鼎函中曾谓:“侄不揣愚陋,为援救亲友起见,创立红十字会。”可以想见,陆树藩原本拟组建红十字会,之所以创设中国救济善会而非红十字会,其实不难理解,因为中国还没有独立的统一的红十字会组织,事起仓猝,一时间也很难组建起来,更谈不上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。那么,如何“植入”红十字“元素”,使救援行动能够顺利开展,在陆树藩看来,只有“变通”将传统的善会组织赋予红十字的新内涵,才具有可行性。

表面上看,中国救济善会与传统的善会别无二致,但运作方式在经陆树藩“植入”红十字后已经大不相同。《救济善会启》称,中国救济善会“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,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”,正是对“旧瓶装新酒”或“移花接木”的诠释。

有学者认为,陆树藩组织中国救济善会,意在救助旅居北方的南方人,是“东南意识”的表达,这一观点,当然有充分的事实依据,中国救济善会创办的目的正在于此。但既然“植入”红十字,就必须遵照红十字会的规则行事。红十字会是中立性国际组织,不允许抱有种族、宗教、政治偏见,救助不分敌我、国别,一视同仁,这一点,陆树藩有理智的认识,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救济善会宣称“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”了。毫无疑问,这是对“东南意识”的超越,也决定了中国救济善会的“红十字”性质。

遵照红十字会规则行事,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,取得八国联军的认可。为此,陆树藩就创建中国救济善会事特咨上海道台余联沅,“伏乞迅赐照会德总领事,声明此系江浙善士募资创办,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,为救治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,务请德总领事颁给护照,俾救济会之人准向北方军前随时救护”。余联沅不负所望,照会驻沪各国总领事,“请烦查照俯如所请办理”。经交涉,“已蒙各国领事会议,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”,希望救济善会本着红十字精神,“按照各国规矩并西美各官向来办法,如有病人或受伤之人,无论友国敌国,理当一律和衷相待救济”。至此,具有红十字会性质的中国救济善会,登上“庚子救援”前台。

(据《河北学刊》)